

The Cantonese Culture and the Hakka Culture in Shenzhen¹

Culture locale de GuangFu et celle de KeJia à la ville de Shenzhen

深圳市本土的廣府文化與客家文化

Liu Lichuan

刘丽川

Received 10 March 2005; accepted 18 March 2005

Abstract Since the moment of establishment the special economical zone in 1979, Shenzhen had already passed 25 years. Due to lacking of relevant and correct propaganda and introduction of Shenzhen, many people have understood this city just as a special economical zone. In addition, Shenzhen is a newly borne city with a mass of migrations of people from all of China. That is why Shenzhen is the only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uses the putonghua as the common language. The present population of Shenzhen is 12,000,000, but in the beginning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special economical zone the local population was 270,000.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resent intellectual layer is not native to the locality, therefor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henzhen local culture is very poor. And that is why some years ago the expression of “a city built within one night” was frequently appeared in articles of the press, and in reports of city leaders, in order to praised that Shenzhen was a new city with rapid development.

The express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henzhen, “a city built within one night”, is incorrect, and is not accord with the real historical truth of Shenzhen either. It is very pity, that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reasons, the Shenzhen local chronicles were merely recorded in two Xin'an Xianzhi (Xin'an County Annals) in the periods of Kangxi (1662-1722) and Jiaqing (1796-1820). The author after coming to Shenzhen University in 1984, has been interested in studying Shenzhen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has carried through a mass of fieldworks in the districts of Bao'an and Longgang (the local culture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se two districts). The author wants to use the materials collected in the Cantonese villages of the Bao'an district, and in the Hakka ones of the Longgang one; to intend to discuss the origins of Cantonese and Hakka clan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clan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and also to explain the functions and roles of these two cultures in the cultural establishments of nowadays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al zone.

Keywords: Guangdong,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al zone, Cantonese culture, Hakka culture, interaction

Résumé Depuis la fondation de Zone économique spéciale de Shenzhen en 1979 après la réforme et l'ouverture, 25 ans se sont écoulés. A cause de l'insuffisance de la propagande et de la présentation, Shenzhen n'est qu'une Zone économique spéciale dans l'esprit des gens du monde extérieur. En plus, c'est aussi une nouvelle ville d'immigration, dont les habitants viennent du quatre coins du pays. Pour cette raison, Shenzhen est la seule ville de la province du Guangdong où le mandarin l'emporte sur le dialecte local. Sa population actuelle est de 12,000,000 mais à l'époque de la fondation de Zone économique spéciale, on ne comptait que 270,000 d'habitants locaux. Donc, la plupart des intellectuels actuels de cette ville sont des immigrants, et ils manquent de connaissance sur l'histoire de cette ville. A la presse ou dans les rapports de certains dirigeants il y a quelques ans, on considérait

¹曾刊於《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2005年5月，Volume 1，Number 1。因排版造成部分錯誤，特再次刊出。

ShenZhen comme “une ville du jour au lendemain ” pour faire l'éloge de sa vitesse du développement . Cela ne correspond pas du tout au fait et à la vérité de l'histoire de ShenZhen. Pour des raisons historiques , on n'a que deux livres d'histoire locale sur Shenzhen qui date respectivement de 1662 jusqu'en 1722 , et de 1796 jusqu'en 1870 . L'auteur , travaillé depuis 1984 à l'Université de Shenzhen , s'est engagé à faire de nombreuses enquêtes à pleine campagne dans les endroits où se concentre la culture aborigène . En mettant à profit ces documents recueillis au cours des enquêtes , l'auteur s'efforce de dégager les origines de ces deux grandes branches de la culture locale , la distinction ainsi que la relation interactive sur le plan culturel . L'auteur tente également de démontrer le rôle que jouent ces deux cultures pour la construction de la culture de Zone économique spéciale de Shenzhen .

Mots-clés: Guangdong, Zone économique spéciale de Shenzhen, culture de GuangFu, culture de KeJia , interaction

摘 要 深圳，自中國改革開放後於 1979 年建立特區以來，至今已有 25 個年頭。因缺乏相關的宣傳、介紹，外界對深圳的瞭解一般也就只停留在“是個經濟特區”的概念上。另外，深圳是個新興的移民城市，移民來自全國各地，深圳成為了廣東省內唯一講普通話的城市。它現有人口 12,000,000，但建特區時，它的本土居民只有 270,000 人。所以，深圳現有的智知階層多是外來人員，大部分人對深圳的歷史缺乏瞭解與認識，所以前幾年在報刊雜誌和某些領導人的報告中，為讚揚深圳的發展速度而不斷出現“深圳是一夜城”的提法。將深圳的歷史定位在“一夜城”上，是不符合深圳真實的歷史事實的。由於歷史原因，深圳的地方史僅有康熙（1662-1722）、嘉慶（1796-1870）年間的兩部《新安縣誌》，實屬可憐。本人 1984 年從北京應聘到深圳大學後，對深圳的寶安、龍崗兩區（本土文化集中區域）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筆者即利用對寶安廣府、龍崗客家的村落所作的田野調查資料，企圖在本文討論深圳本土文化中的廣府與客家這兩大族群的源流，以及在文化上存在的差異與互動關係，並試圖說明這兩種文化在今日深圳特區的文化建設中所應具有的作用。

關鍵詞: 廣東；深圳特區；廣府文化；客家文化；互動

前 言

地處廣東省東南沿海的深圳，其地名最早見於康熙《新安縣誌》，是從流經現在人民橋下的那條深圳河而得名。它原是寶安縣，自中國改革開放後於 1979 年建特區時，才將寶安縣升格為深圳市，至今已有 25 個年頭。因缺乏相關的宣傳、介紹，外界對深圳的瞭解一般也就只停留在“是個經濟特區”的概念上。另外，深圳是個新興的移民城市，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因此，深圳成為廣東省內唯一講普通話的城市。據《深圳經濟特區年鑒》（1984 年創刊號）記載，1979 年“寶安縣有 60, 730 戶，243, 800 人，其中，鄉村人口 245, 200 人，城鎮人口 26, 000 人”。² 也就是說，建特區初期，它的本土居民只有 270, 000 多人，但現有深圳的人口已達 12, 000, 000 人。從這個數字可看出深圳現有的智知階層和幹部隊伍多是外來人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深圳的歷史缺乏瞭

解與認識，因此，前幾年在報刊雜誌和某些領導人的報告中，為讚揚深圳的發展速度而不斷出現了“深圳是一夜城”的提法。

將深圳的歷史定位在“一夜城”上，是不符合深圳真實的歷史事實的。由於歷史原因，深圳的地方史僅有康熙、嘉慶年間的兩部《新安縣誌》，實屬可憐。本人 1984 年從北京應聘到深圳大學後，就與先生張衛東一起利用寒暑假，對深圳的龍崗、寶安兩區（本土文化集中區域）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並於 2002 年出版了專著《深圳客家研究》。³ 筆者即利用對寶安廣府、龍崗客家的村落所作的田野調查資料，企圖在本文討論深圳本土文化中的廣府與客家這兩大族群的源流，以及在文化上存在的差異與互動關係，並試圖說明這兩種文化在今日深圳特區的文化建設中所應具有的作用。

1. 深圳的廣府族群

² 《深圳經濟特區年鑒》（創刊號）、深圳經濟特區年鑒編輯委員會、1984 年、P.120。

³ 劉麗川：《深圳客家研究》、2002 年南方出版社。該書為 1998 年廣東省人文社科研究專案。

1.1 廣府族群的源流

深圳歷史上的先住民，宋元以降主要是廣府人，即生活在珠江三角洲的行政劃分隸屬廣州府的族群，他們說的粵方言是中國漢民族的七大方言之。深圳廣府人的多數在宋元之交時，因避戰亂，由南雄、番禺、增城、東莞等地，從東部進入深圳，且此移動直到清末。從那時起，深圳就成為了一個移民地區。現在，主要居住在羅湖、福田、南山、寶安等區。因篇幅關係，僅以 2 個姓氏為例，如：

寶安區福永鎮懷德村（現萬豐村）的潘氏，北宋末年為避中原遼金之亂，由河南滎陽潘地遷至廣東南雄珠璣巷，後潘氏先祖仲鑿公攜家移居東莞太平鎮。宋靖康年間，仲鑿公又攜家族移住懷德村，為現今萬豐村潘氏在深圳的開基祖。潘氏，乃北宋宰相潘仁美之族系。⁴

福田區石廈村趙氏，自稱趙匡胤之後。宗祠裏有 1996 年趙氏宗親所立石碑，上刻“趙氏福善堂宗祠碑記”，碑記曰：“……再至宋太祖趙匡胤，獻身社稷，伐寇平亂，南征北戰十八載，統揮兵官，屢建偉功，受周禪而有天下。禦置玉牒分三派，傳留後世，俾日後子孫偶有相逢，以玉牒序昭穆。至先世祖文旭公、養石公及懷卜公昆仲三房，從東莞遷徙至深圳市石廈村，開宗立祠”。

1.2 廣府族群的生產方式

雖說沿海廣府人主要以捕魚、養蠔、種植為業，但廣府人作為族群來看，則多喜經商。例如寶安區沙井鎮的新橋村（因村裏有一石橋得名）一帶，清初時就已成為商業中心，這是因為流經村中的新橋河能與珠江口相連，貨物在此上船可出海轉運至廣州，因而河上往來船隻如梭，北橋頭建有碼頭，橋東就是圩集，名曰“清平圩”。該圩是當時深圳西部松崗、石岩、公明、沙井、福永等地的商品交易和集散地，因此是與深圳其他幾個圩集如西鄉、南頭、大鵬齊名的四大古圩。古圩中，除大鵬以說“軍話”的人為主外，其餘 3 圩則都以說粵語的族群為主。

新橋村民都姓曾，曾氏先祖于南宋初時流落到南雄珠璣巷，後經廣州遷移到此。曾氏族人經商頗有道，如村內石橋為曾氏所修，他們就在橋

頭設有欄杆，商人小販過橋必須繳納路費，這不就是現在路橋收費站的前身嗎？曾氏在清平圩上開的商鋪也不少。現在，清平圩所在街巷舊址的一邊已改成民居，另一邊仍可見當年商業街的痕跡：商鋪的建築格局都是臨街而立，米店、布店、幹魚海貨店應有盡有，街尾處還有當舖。在一間老店鋪門口，還留著一個半人高的舊神龕，這是商人為求神佑財時用的。村民說，清平圩的繁華一直沿續到現代，民國時期的糧站、人民公社時期的供銷社都在這裏。改革開放以來，沙井新修的主要幹道新沙路通車後，新橋村就離開了交通要道，圩市也就日見式微。

1.3 廣府族群的民居

深圳廣府族群的聚落以圍村為主要形式。圍村即是村民營造起一圈兒封閉的高大圍牆，並開有村門，然後在牆內修起一排一排的橫屋，構成縱橫相交的巷道，這就是圍村了。之所以要圍起來，則是出於安全的需要，因為那時的東南沿海“山賊海寇”猖獗，社會不太平。

由於是人口聚集地，一些圍村的名字也就變成了深圳的老地名，如位於深圳中心道路的深南大道東邊的一個汽車大站——蔡屋圍，就是南宋後進入深圳的廣府人蔡氏家族的單姓圍村。福田區的水圍、寶安區的水門老圍、水門新圍、悅興圍……亦然。

深圳特區建立後，經過 20 多年的市政建設，城市面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不少廣府傳統村落（含客家村落）的格局已變得面貌全非。對於這種變化，筆者的心情亦喜亦悲，很是複雜，非幾句話所能講清。值得慶倖的是，一些散落在變化未及的某些地點的傳統建築還能保留下來，為今天的深圳人證明著深圳並非是“一夜之城”，她是有著自己的“過去”。羅湖區筍崗村的何氏元勳老圍就是其中的幸運兒。

元勳老圍已有 600 多年的歷史。老圍的開基祖東莞人何真，他被朱元璋視為“識時達變”的開國元勳，因此後人就用“元勳”給他建造的圍村命名。

老圍是典型的“廣府圍”，很具規模：圍內有 3 條縱巷、6 條橫巷，100 多間房，圍牆四角還有炮臺。為強化防禦，當年圍牆外還開挖了一條護河，現在是看不到了。圍內老人說老圍的大門原來是鑄鐵製造的，文革時“破四舊”，有人偷

⁴參見深圳《萬豐村潘氏族譜》。

拆下來當廢鐵賣了。圍村後部建有一座祠堂，至今何氏族人還在此祭祀先祖。

在廣府圍中，祠堂都是作為單獨的建築出現，所在位置並不固定，要依風水而定。雖說圍村是一姓或幾姓人共住，但人們居住的橫屋，多是一層帶閣樓的“單元房”，內有灶房、客廳、臥室等，很適合小家庭生活。講究的橫屋，人們往往將屋頂兩旁的硬山牆，修成呈∩形的曲線狀作為裝飾，俗稱“茶壺耳”或“鍋耳”，是說它的形狀象茶壺或鐵鍋的手把。這一排排的曲線山牆，成了廣府村落的建築性標誌。

在寶安，現在仍具規模的廣府圍村，還有上文提及的沙井鎮新橋村和福永鎮鳳凰村。

新橋村器宇軒昂的“曾氏大宗祠”始建於700多年前，建築面積達千餘平方米，由門樓、牌樓、中堂、後堂等部分組成，五間三進的格局非一般祠堂所能比。祠堂經歷代翻修，是深圳保存完好的最大古祠堂。祠堂後的大戲臺，每逢年節，劇班就在此演戲娛神又娛人。祠堂旁還有一群古建築，如觀音天后古廟、太祖廟、桐軒書室等。

福永鎮鳳凰村的村民中，90%是南宋名相文天祥弟弟文天璧的後人。他們為避亂從江西輾轉遷移到寶安，至今700多年，族人中最小的已是第29代。以詩書傳家的文氏族人，在鳳凰村留下了建築面積為180,000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築群，其中包括廣府民居群落、祖祠、公祠、家塾、書室、石橋、磚塔等，它們都是深圳不可多得的人文財富。

2. 深圳的客家族群

2.1 深圳客家族群的源流

客家人是操客家方言的族群，從我們搜集到的族譜看出（因篇幅問題，就此省略），他們是從深圳東北和東部方向（嘉應州、惠州、潮州）進入的，進入的時間比廣府人要晚。客家人現在集中在龍崗、鹽田兩區，並散居於廣府人聚居的寶安、南山、羅湖等區。說到客家人“晚來”的原因，就必須先簡略地談及清初的“遷海”與“複界”。

清初，為了打擊鄭成功的海上力量，清廷于順治十八年（1661）下達“遷界令”，讓北起遼

東、南至廣東的沿海居民內遷30裏，將沿海一帶造成無人區；康熙三年（1664）又向後“再遷”50裏。受“遷界”、“再遷”所累最重的是福建、廣東兩省。臺灣平定後，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始“複界”，而新安縣（即今日之深圳、香港一帶）在康熙七年已率先“展界”。但遷界區的原住民並不能全部返回，很多田地繼續拋荒，政府因此發佈了“招墾令”。此時，生活在贛、閩、粵交界山區的客家人丁口增殖很快，“招墾”正可解地少人多之患。但因清政府把福建的“複界區”用來安排鄭氏的投誠官兵，廣東東南沿海的“複界區”就成為客家移民的遷徙方向。

所以，深圳（包括香港九龍、新界）的客家聚居區，是“複界”後形成的疆域清楚、人口集中、發展成功的客家新區，它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遷徙運動的重要成果之一，這也就是深圳客家研究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原因。

清初的“遷海”，對深圳的地方經濟打擊相當沉重。“招墾令”頒佈後，由於當時沿海自然災害頻仍，又時有“遊匪嘯聚，搶掠邊民”。《新安縣誌》記載，到康熙二十七年的幾十年間，招徠的墾民少得可憐，甚至有些年根本無人進入，直到康熙三十年後，客家移民才陸續增多，此移動直到嘉慶年間才結束。康乾以後，客家與廣府就在深圳的東部與西部各占“半壁江山”。

2.2 客家族群的生產方式

重農耕，是客家傳統生產的支柱。同時，客家人又極重視文教，“詩書傳家久”是他們堅信不移的生活理念。來深墾殖的三百年間，他們很快適應了僑居地生活，在堅持耕讀這一傳統文化中不斷發展自己。以龍崗區坑梓鎮江夏堂黃氏為例：

黃居中夫婦（是坑梓黃氏開基祖）攜3子於康熙三十年（1691）移入坑梓，依族譜記載，當時他們的經濟地位也就是個自耕農，因為他們還要借助先住民高氏的土地建祠開基，到今天，黃高兩姓中還流傳著當年居中“借地立祠”的傳說。居中去世（雍正四年，1726）後，族譜裏對他的總結已是“公於康熙三十年由江邊村（在現今坪山鎮，其父黃朝軒于清初由梅州遷惠陽，再遷江邊村——筆者注）遷居坑梓，創業立祠，廣置田園”。這裏的“廣置田園”，應是與兒子們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時，他們已顯然成為地主，

完成了身份上的轉化。小兒子振宗的記錄則為：“自創糧米九十餘石，至乾隆十八年癸酉歲，遷于新喬圍立業居住”。新喬圍又稱新喬世居，占地面積 8000 多平方米，是客家人進入深圳後的第一批大型民居建築，雖歷經 250 多年的風霜，現仍在供人居住。

客民們崇文重教，深圳的每一個客民聚落都會有一所私塾供子弟讀書。“光緒維新”時，他們最先接受興辦新學的思想，坑梓黃氏於 1906 年辦起了新式學校——光祖學堂，距離清廷制定新學《學堂章程》的 1903 年還不到三年！觀瀾鎮的客民陳氏在 1914 年興辦了振能學校，一時間，它與光祖學堂成為了惠（州）、東（莞）、寶（安）一帶的名校。

傳統的客家文化秉承了中華儒文化，都是重農輕商。但深圳的客家人既堅持以農為本，又不失時機地在本地商業領域進行開拓，如龍崗鎮羅瑞合村的開基祖羅瑞鳳從商販起家，以後將店鋪開到東莞，並遠至廣州、潮州、汕頭等地。有了資本後，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在龍崗鎮建成了占地 24,816 平方米、素有“九天十八井，十閣走馬廊”的大圍堡鶴湖新居。康乾盛世時，廣東的惠州府、廣州府沿海諸縣商貿活動非常活躍，到乾隆三十五年前後，廣東已是百業昌盛，城鎮繁榮。此時坑梓黃氏從第四代起，用長途販運的手段開始發家，到第五、六代，特別是第五代的黃廷元很有反傳統的精神，明確提出“士農工商各事一業，方為濟世完人”的做人標準，鼓勵族人經商，他們開油房、糖寮；在淡水、坪山圩集開商店，生意越做越大，與廣州“十三行”都有了生意上的往來……由此，黃氏在坑梓，乃至惠東地區漸成頗具影響力的巨族，將自身的社會地位提升到了地主紳商的階層。

正因為如此，深圳的客民才能有資本興修大面積、上規模、高規格的堅固圍堡，至今，龍崗區的地面上還留下上百座的這種建築。

總起來看，作為移民，無論東部西部都表現出很強的進取精神，都有不錯的業績。但相比之下，由於文化上的差異，東部客家人的發展比西部廣府人要勝一籌，從民居建築上也可看出端倪。

2.3 客家族群的民居

深圳客民的典型民居是圍堡，多以“世居”命名。它們的建制（特別是早期）與粵東北的興

甯、梅縣等地的圍龍屋有明顯的傳承關係，如整座建築“聚族而居”；前低後高；內部居祠合一；中軸線上是族人公共活動的堂屋（根據圍屋大小，有二、三進或四進），最後一進是祠堂；兩旁為族人居住的橫屋；屋前有半圓形池塘（亦稱月池）與禾坪；屋後是弧形的圍龍屋和化胎，這是因為第一代深圳客民多來自這些地區。

但深圳地面上的社會情況與粵東北的興、梅有別，僅依清《廣東海防匯覽》卷 41 載，從康熙二年，到嘉慶十五年海盜張保仔歸正的 147 年間，盜寇在廣東沿海流劫不斷，因此深圳（包括惠東地區）的客家圍堡又有自己的建築特色：整座圍堡用高牆圍合，呈全封閉狀；位於建築最後的圍龍屋中部，建起一座高大的望樓，成為圍堡的制高點（戰時瞭望，平時作私塾）；圍堡四角是高三四層的礮樓；屋頂上鋪有小徑連接望樓、礮樓，這是為戰時調動兵力之用（俗稱走馬廊）。鶴湖新居的“十閣走馬廊”的“十閣”，即指有 10 個“樓”，因為鶴湖新居呈回字形，其四角有 8 個礮樓，再加上回字後邊中部兩座望樓，就共有 10 閣了。

圍堡的外部圍牆上還嵌入了一排排用花崗岩打造的槍眼，它們與礮樓、望樓編織成一張交叉火力網，走馬廊又強化了圍堡的防禦功能。全封閉、礮樓、望樓與走馬廊是深圳客民在粵東北圍龍屋建制基礎上的因地制宜與創新。

客家人聚集的龍崗區，現仍留有大中小型上百座圍堡群（具體數字還無人能說清），建築年代上自乾隆，下至宣統，其中以乾隆、嘉慶、道光年間為興盛期。圍堡中首屈一指的當屬坪山鎮曾氏建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大萬世居和上文提及的鶴湖新居，它們都是占地面積達 2 萬多平方米的大型圍堡。圍堡內的石刻、木雕、彩繪藝術實屬精湛，鶴湖新居已被龍崗區、鎮兩級政府辟為“客家民俗博物館”加以保護。坑梓的龍田世居、長隆世居，橫崗的茂盛圍，坪地吉坑世居，葵湧福田世居，龍崗環水樓，坪山豐田世居等等都是圍堡中的精品。

3. 客家文化與廣府文化之間的互動

客家人與廣府人同在深圳的土地上生活了 300 年，這兩大族群從語言、風俗、信仰、飲食、

服飾等習俗方面都存在著差異，因此，作為族群整體上來說，彼此間的關係並不密切。但不管如何，兩個族群總是會有這樣和那樣的接觸，特別是處在接合部的兩個族群的接觸是不可能避免的，在客民進入初期，接合部的兩族群還為爭奪土地發生過械鬥。

如位於深圳北部鳳凰山南麓的泥崗村，是個以鄭、曾二姓為主的純客住村，建村僅有 90 幾年的歷史。聽第一任村支書鄭賢金說，他們先祖未來之前，南面蔡屋圍的人是到這裏種菜和上鳳凰山、筆架山砍樵的。客民剛移來時，蔡屋圍的人來驅趕他們，雙方發生對峙，泥崗人就拉來土炮開火，加上上步等村客民趕來支援，蔡屋圍人才退下去，以後就再沒有這種事情了。類似的情況，在接合部一般是會發生的，但當雙方都承認了比鄰而居的格局後，就會隨之出現交往。下面就從語言、飲食、民居三方面，對彼此間的相互影響試作一些梳理。

3.1 語言間的互動

3.1.1 解放前

仍以泥崗村為例。到 1949 年解放前為止，泥崗村民在村周邊的銀湖、八卦嶺、清水河一線逐年墾殖，更有些田畝向東伸進，與筍崗、田貝、水貝、田心等廣府村的農田形成“插花地”。而這些村落的人也要上筆架山、鳳凰山砍樵。這種生產、生活方式，使兩個方言群體自然要保持一定的來往。有了往來，雙方間就會產生婚配（總的還是各自在本族群間通婚）。因此，泥崗村裏少部分人成為雙語人，特別是娶有廣府媳婦的家庭，子女從小往往隨母親說粵語，而母親因生活在客家村裏，時間久了也會學說客家話。反之，由於客家女的勤勞能幹是出了名的，客家男人卻是大男子作風，社會上就有“娶妻當娶客家妹，嫁郎莫嫁客家郎”的話語流傳，所以在泥崗周邊的廣府村裏，也有娶泥崗客家女為妻的，村裏也有了會客家話的雙語人。

3.1.2 解放後

解放後，泥崗村會客、粵語的雙語人數上升很快，原因有二：第一、社會生活發生了改變。政府把筍崗、田心、田貝、水貝、草埔、泥崗合為莆崗鄉，共同的社會活動多了，就造成講粵、客語的村落因行政區劃分的組合而增加了交往，

莆崗鄉因而成了雙語社區。尤其是村幹部，要到鄉里開會、辦事，彼此學會對方的語言，會更加方便。當然，莆崗鄉里講粵語的人多，泥崗村主動學說粵語的人要多些。

第二，學校教育的結果。五六十年代，泥崗村沒有小學，適齡兒童要到筍崗小學讀初小，去蔡屋圍讀高小。這兩所小學當時的教學語言是粵語，因此泥崗的學齡兒童就都學會了粵語。泥崗村雙語人平均年齡的下降，表明了雙語群體在社區內的迅速擴大。到 1979 年建特區前，雙語群體在村裏已占絕對優勢，其中不少人的粵語已運用自如。

另外，60 年代初，泥崗村辦了一所只有 1——3 年級的小學，小學的語文老師用普通話教學；筍崗的高小和中學語文課也用普通話講授。雖然那時老師的普通話水準欠佳，但這裏的客家和廣府兒童就都接受了普通話。當然，普通話比之粵語，是勢力微弱得多的弱勢語言。

3.1.3 建特區後

特區建立後，各省移民大量進入深圳，為了交際的需要，深圳的廣播、電視等傳媒和市區兩級幹部的工作用語為普通話；所有幼稚園和各級學校的教學語言都使用了普通話。這樣一來，普通話在深圳原住民（廣府與客家）與青少年群體中迅速被接受。村裏的幹部、年青人不用說，就連村裏的老年人也要學說普通話，否則，他們在出租房屋時會遇到與外來人員交流上的困難。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普通話在深圳已經得到全面的普及。

外來移民到深圳的時間一長，因收看、收聽香港、廣州的電視、電臺，特別是與當地人的接觸，不少外省人也學會了聽或說粵語；在龍崗工作生活的外省人也有學說客家話的。因此，深圳是個多語人相當多的城市。

3.2 飲食習俗的互動

因居住的環境、條件，生產方式，生活水準等因素的不同，就形成了粵菜（即廣府菜）與客家菜的區別。粵菜，是中國著名的四大菜系之一，以淡、鮮、美著稱；而客家菜（又稱東江菜）的特點是鹹、肥、香。粵菜和客家菜在深圳的東西兩部一代一代地被廣府、客家兩族群傳承著，但畢竟是比鄰而居，飲食中的一些習俗自然會互相影響。如：

3.2.1 吃“大盆菜”

深圳、香港的廣府地區，在元宵節有吃“大盆菜”的習俗。“大盆菜”又稱“新安盆菜”、“盆宴”。相傳南宋末年，元兵入侵，南宋皇帝無力招架，一行人逃到香港新界。當地居民殷勤招待，但匆忙間找不到大容器，就用木盆盛裝菜肴，大盆菜由此產生。以後從九龍、新界至深圳南頭、寶安沿海的廣府居民便出現以盆菜宴客之俗，並延續至今。香港租讓給英國之前，這些地方都隸屬新安縣，故又稱“新安盆菜”。⁵此宴 10 人一桌，每桌僅備一份用錫盆盛裝的盆菜。盆內由 10 幾種葷素菜肴層層疊置，盆底一般放蘿蔔、山芋、白菜等素菜，然後逐層覆蓋上肉、鴨、鵝、魚、雞、魷魚、髮菜、香菇、蠔等菜。

吃“大盆菜”時，人們圍桌而食，配以茶酒，別有風味。元宵節中的這種飲食習俗，很能引起“聚族而居”的客家人的興趣，特別是與廣府人相鄰近的客家人，就都有了元宵節吃“大盆菜”的習俗，如寶安、南頭、布吉一帶客家人即如此，但在龍崗腹地的客家人是沒有這個習俗的。不過，客家人在盆菜裏置放的東西雖與廣府人大致相同，但也喜歡再加進些豬皮、油豆腐、腐竹等。

3.2.2 鹽焗雞

飲食中，嶺南的廣府和客家兩大族群對雞都是獨有情鍾，而且做雞的方法又多，又各有花樣。鹽焗雞，是客家菜系裏一道鹹上加香的名菜。其做法是把雞宰好取出內臟，用鹽、蔥汁擦其腹內，用濕草紙包好，再在鐵鍋裏用粗鹽做成窩，把雞放進去，加蓋兒密封後用文火蒸 40 分鐘左右，取出放冷切成塊狀，裝迭在盤即成。⁶

過去，各家婦女都養雞，有客人來時就抓只雞待客。因其味道鹹香，寶安的廣府人家，也有模仿做客家鹽焗雞的。現在，鹽焗雞已經很自然地寫進了深圳廣府餐館的菜譜。鹽焗雞也受到外來北方人的歡迎，他們在飯店吃飯時，也經常會點這道菜。

3.2.3 仙人粿

仙人粿，是客家民間極普通的一種夏季清涼小吃。它是用一種叫仙人草的莖熬水，熬好後在

水中摻入薯粉，冷卻後即成了似果凍樣的深咖啡色或黑色的食品——仙人粿。吃的時候將仙人粿凍盛入小碗打碎，加入糖水或蜂蜜水，吃起來清涼爽滑、甘甜可口。夏天，客家人幾乎家家都做這種食品消暑，來到深圳的客家人也就把它的做法帶了進來。

由於仙人粿好吃易做，也受到廣府人的青睞，成了他們的解暑小吃。其實，不僅在深圳，仙人粿在珠江三角洲都得以流行。七十年代廣州已有食品廠將仙人粿加工成粉末狀出售，名稱是“即食涼粉”，因為只需將此粉末加入沸水中，冷卻後即可食用。九十年代始，深圳的大商場裏就能買到罐頭裝的“即食涼粉”，它成為南北方的人們都很喜歡的食品，這不能不說是客家的仙人粿為中華清涼飲品做出了貢獻。

3.2.4 吃早茶

吃早茶，本是廣州地區早上的飲食習俗，粵語稱“飲茶”。飲茶，興起於 19 世紀末的廣州，光緒年間廣州商貿業發達，商人為談生意需要一個高雅且安靜的場所，茶樓應運而生。茶樓供應蝦餃、燒賣、粥、粉、面等各樣小吃，風味以廣府為主，兼有潮汕、客家的。服務生會把吃食用小車推到顧客桌前，任顧客自由拿取。抗戰前後，茶樓逐漸擴展到珠江三角洲的城鎮及東、西、北三江沿江的重要運輸樞紐，甚至遠至粵北、粵東北的客家山區。離廣州僅百餘裏的深圳自不例外。

建特區後，深圳的餐飲業變化很快，為適應天南地北人群的口味，各菜系的大小餐館林立。人們對菜肴的選擇變得寬泛起來，只要好吃，什麼菜系都不會拒絕。不僅作為客家地區的龍崗備有“飲茶”功能的酒樓到處都有，就是南來的外鄉人遇有家人相聚、招待朋輩，甚至業務洽談時都會想到去“飲茶”，並把它叫作“吃早茶”或“喝早茶”。由於受歡迎，現在深圳酒樓裏的“早茶”可以一直吃到下午了。

餐飲業的發展，擴大了深圳人的飲食範圍，使之變得豐富而多樣化，從而提升了人們的生活水準。

3.3 民居建築的影響

有人說“建築是凝固的史詩”，此話極有道理。由於廣府族群比客家族群早到深圳四五百年，在這期間廣府圍村已逐漸形成自身固定的建

⁵陳乃剛：《嶺南文化》，同濟大學出版社，1990 年，P.177。

⁶《梅縣地區飲食行業常用菜譜》、梅縣地區副食品公司編印，1972 年 12 月，P.20。

制，而客家族群則是後來者，這就為它可以學習廣府村落的建築模式創造了時間上的條件。因此，在深圳客家圍堡建築中，可以清楚看到廣府圍村對它的影響，主要有二，下文分別來談。

3.3.1 小家庭住所

上文“2.3 客家族群的民居”一節，對客家圍堡的建制已有描述，並談到它與粵東北的圍龍屋有源流上的關係。客家人的居住理念是“聚族而居”，所以在贛南、閩西、粵東北的傳統客家民居中，大家族集中住在一個土樓或圍龍屋裏，而小家庭的房屋被分割成一間一間的。為了防禦的需要，小家庭從大家，家族或宗族的利益第一是最基本的原則。因此，土樓或圍龍屋裏的小家庭，就象住在今天的大集體宿舍一樣。

但客民在康熙三十年後進入深圳，特別是經歷了康乾盛世，廣東農村的商品經濟得到發展，海洋通路因“複界”而又開放，促使族中人口大規模地流動起來，小家庭的經濟實力得到加強。而作為過去支持宗族生存的經濟支柱就逐漸減弱，宗族組織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受到了動搖。這種情況必然會反映到民居建築之中，那就是圍堡裏小家庭的住所結構發生了改變：將集體宿舍式的單間房，改建成單元房，這正是廣府民居的模式。我們在深圳客民的早期圍堡如上文提及的新喬世居中，就已見到小家庭的住宅已為單元式。而且，這種建制一直持續到清末。

3.3.2 碉樓上的“茶壺耳”

“茶壺耳”，本是廣府圍村中建在橫屋屋頂兩端的硬山牆，既可防火，又有裝飾作用。深圳的客家人對其很是欣賞，也仿效廣府圍村，將它運用到圍堡的建築中。但這個學習是有個過程的，學習後還有所出新。

圍堡與圍村從外形上看去，最大的差別就是高高聳立在圍堡四角的碉樓，“茶壺耳”就被用在碉樓的頂端。我們將龍崗現存的圍堡進行比較後，就“看到”了這個學習“過程”，為敘述方便起見，就以坑梓黃氏的圍堡群為例，因為他們的系列建築完整，且世系清楚。

黃氏進坑梓，於乾隆初期開始營造圍堡，乾隆早、中期所建圍堡的碉樓頂部，都是做成“人”字形的硬山牆，與其他住房的屋頂無異，如新喬世居、龍灣世居、秀嶺世居、龍圍世居等。到乾隆晚期（乾隆五十年，即 1785 年後）以後所建圍堡的碉樓頂部，大部分都裝飾上了“茶壺耳”，

如秀山世居、長龍世居、龍田世居、回龍世居、盤龍世居等等，直到清末光緒十四年（1888）建的榮田世居——黃氏最後一座圍堡，仍保持著這種模式。

從乾隆初期到乾隆晚期的變化，我們認為，這就是一個認識和學習的過程。初到深圳的客家人修建圍堡時注重的是實用，其興奮點在於修築起即能安全保護自己，又能防禦襲擊的托身家園，至於裝飾性的東西，只是有限地運用到處於圍堡中軸線的大門和堂屋上。因此，就是早期的大型圍堡規模雖大，但整體風格較簡樸，碉樓頂部依慣性建成了“人”字形。隨著社會的發展，經過三四十年的奮力拓殖，到乾隆晚期時，客家人腳跟已經站穩，經濟實力進一步加強，加之對自己的廣府鄰居有了更多的觀察、瞭解，這才有可能把對廣府式“茶壺耳”的賞識，變成移植的行動。

“茶壺耳”被用在方形碉樓頂部左右處和望樓屋頂的左右兩邊，使本來就高於圍牆的碉樓、望樓更顯威嚴峻峭。與廣府村落橫屋上的“茶壺耳”相比，碉樓“茶壺耳”的跨度要大、牆體也要厚些。這樣，一座圍堡，最起碼就具有 10 個高聳的“茶壺耳”。為了突顯華美，還用一條寬大的灰塑花草圖案勾勒出“茶壺耳”的邊緣，道光年間的龍田世居還在每“耳”頂端插上一支大大的三叉戟式的避雷針。這一切，都顯示了屋主人的財力、審美傾向和建築的檔次。有的圍堡在禾坪兩邊還建有耳房，耳房面月池方向的山牆也做成“茶壺耳”，如黃氏乾隆末年在坪山鎮建的豐田世居就如此。

圍堡“茶壺耳”式風火牆，是客家族群進入廣東東南沿海後，在與廣府族群的接觸中習得的，是其他客家聚居區的民居所不具備的建築元素，它成了惠東、深圳一帶客家民居的獨特之處，具有極強的地域特徵。

4. 本土文化在特區建設中的作用

誠如上文所說，深圳的文史資料因社會動亂之故變得極其匱乏。深圳的歷史大部分“若明若暗”，一個地區，一個城市，讓自己的歷史處於這麼一種狀態，與今日深圳的身份極不相稱。應該看到，在今天特區建設中，深圳的本土文化不

僅不應被忽視，反而在學術上應領有一席之地，進而讓世界瞭解深圳。筆者的這篇拙文，也正是想在達成此目的之上，作出一點努力。

4.1 要想讓世界瞭解自己，自己就必須瞭解自己

深圳的文化工作者們應深入民間，對本土文化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並在學術層面上獲得應有的地位。現在，深圳的客家文化經過學人十幾年的努力，已有了較好的結果。而對本地廣府文化的研究還顯得較薄弱。如果能把本地的廣府文化與客家文化的發展史搞清楚，基本上就重構出了深圳的近代史，而只有理清了它們的發展脈絡，才有可能真正瞭解深圳的歷史，也才能談到正確地向外界宣傳、介紹自己。

4.2 圍村、圍堡在村鎮規劃中的作用

深圳宋元以來的歷史被定格在傳統的圍村和圍堡身上，一旦遭毀，也就永久消失了，歷史不可能重新來過。我們在考察中看到，許多建築存在不同程度的毀壞，實令人痛心不已。目前，廣府的鳳凰村、筍崗老圍，客家的“大萬”、“鶴湖”已是保護單位，但經費、人力的投入都有限。如何保護好這筆文化遺產，用好這筆財富，這些問題都應提到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這幾年，學人的呼聲逐漸高漲，但在地方行政部門方面，卻推動得較吃力，其中的原因很多。

近二十幾年，中國大地隨處能見到富裕起來的城鄉一片拆房建房忙，在追趕潮流的心態驅動下，各種與當地傳統風格大相違背的建築，有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其結果，一片一片具有鄉土特色的景觀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模樣相差無幾的高樓大廈，“千村一色，百城一面”似乎成為時下的一股趨勢。看一部電視劇，你簡直猜不出故事究竟發生在哪里。現在，市政府將寶安、龍崗兩區納入深圳的總體規劃之列。那麼，這兩區的鄉鎮規劃中，鄉鎮的整體形象應如何設計、它的建築標誌應如何選擇、如何將歷史與現代有機結合，發揚自己的區域文化優勢，從而展現出有別於他人的特色，這其實是規劃中的一個指導性問題。

寶安、龍崗兩區的本土文化底蘊應是手中的“王牌”，在村鎮規劃上，在還有條件的地方，如能緊緊把握住傳統文化的“文脈”，善用那些

有特色的建築“基因”，就能創造出富有地區個性和精神氣度的傑作。這樣塑造出來的村鎮形象才真正具有了靈魂，也才會讓人“找到了感覺”。遺憾的是，到現在，這樣的村落還沒有見到。最近，從深圳清華建築設計分院得知，他們獲得了橫崗鎮的村鎮設計權，並有意引進客家建築的某些元素，我們期待著它的誕生。

4.3 圍村、圍堡在旅遊中的地位

這一部分不準備多談，因為個中理由是非常明白的。深圳的旅遊業總體發展得不錯，但她的旅遊吸引主要是深圳的城區新面貌、華僑城的民俗村與世界之窗，而民俗村和世界之窗都是人造景觀。在開發本土的旅遊資源上，市里下的工夫就顯不足，也突現出學術上的研究和宣傳的不足。

寶安、龍崗兩區蘊藏著豐富的旅遊資源，那就在於她本土的傳統建築和傳統文化，它們作為文化遺產是發展旅遊的珍貴基礎。龍崗鎮將鶴湖新居辟為客家民俗博物館後，已初見成效，特別是節假日，接待了不少海內外的遊客，既向遊客介紹了客家文化，又得到了經濟利益，可用於“鶴湖”的維修保護。但這還很不夠，如果能把西部的鳳凰村、新橋村的廣府文化資源整合起來；東部以鶴湖新居為龍頭，以龍崗的上百座客家圍堡群為背景，加上兩大族群的飲食文化、山歌戲劇、舞麒麟舞獅等傳統遊藝，開展廣府文化和客家文化旅游完全能做得有聲有色，這需要得到行政部門的重視和支持，才有發展的空間。如能實現，東西兩區的本土文化旅游，就為深圳的旅遊發展插上了雙翼，再配合市區成熟的旅遊項目，深圳的旅遊業，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在廣度上，都能以一個嶄新的面貌亮相在南中國的旅遊舞臺。

參考文獻

- (康熙)《新安縣誌》
- (嘉慶)《新安縣誌》
- (道光)阮元 《廣東通志》
- (清)盧坤 《廣東海防匯覽》
- (清)杜臻 《閩粵巡視紀略》
- 深圳博物館編 《深圳近代史》 文物出版社 1997年
- 郭培源 《福永古文化考略》 花城出版社 2001年

作者簡介: Liu Lichua (劉麗川), Professor,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6, P.R. China.
劉麗川：深圳大學教授，中國廣東深圳，518026。